

西文之中国文献学初议

张西平

做中国学问,文献学是其基础。“文献学”一词源于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的“全祖望亦私淑宗義,言文献学者宗焉”,又在《近代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当代文献学大家张舜徽先生在谈到中国文献学时,总结历史,阐明近义,对中国文献学做了很好的表述,他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讎学家。所以,校讎学无异成为文献学的别名。凡是有关整理、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都由校讎学担负了起来。假若没有历代校讎学家们的辛勤劳动,尽管文献资料堆积成山,学者们也是无法去阅读、去探索的。我们今天,自然要很好地继承过去校讎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做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①

张舜徽先生所讲的中国文献学的范围是中文文献。但至晚明以后,中国的历史已经纳入到全球史之中,晚清之后,更是被拖入以西方世界为主导的世界历史之中。这样,来华的传教士,做生意的西方各国东印度公司,驻华的外交官和汉学家留下了大批关于研究中国的历史文献,翻译了大批关于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由此,中国文化开始以西方语言的形态进入西方文化之中,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记载也再不仅仅是中文文献组成。我们将其称为“中学西书”。很自然,这批“中学西书”是西方中国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治西方汉学之基础。但对中国学术来说,这些“中学西书”也构成了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①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3页。

根据张舜徽的理解,我们可以说,在西方汉学的历史中也同样存在一个西方汉学文献学的研究领域,西方汉学文献学作为一个西方汉学研究的基础研究领域是完全存在的。进一步扩展来讲就是“西方语言的中国文献学”,简称之“中学西书”。金国平建议建立“西方语言中国史科学”,他认为:“只要充分地利用在华传教士留下的这批宝贵历史遗产,比勘汉语史乘,从新的视角对已知史料进行新的诠释,披沙觅金,某些较具有争议的重大历史事件真相的发潜彰幽无不无可能。”^①

从全球史研究的新进展来看,如果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写作,就必须将地域史的研究纳入全球化史研究的总体框架之中,这个进程不是东方被动地适应西方,而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迄今为止的世界史写作大都建立在单一地域史的写作基础上,对于文化与文明之间的互动关注不够。如果从全球化史的角度构建中国历史,中西之间的互动就成为关键,由此,传教史和贸易史就成为必须研究之材料。从东西互动的角度来构建中国史,就必须将“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中国近代历史就不仅仅是一个西化的历史,同时也是一个西方不断吸收东方,从而促进西方变化的历史,由此,西方汉学史的研究就不再仅仅属于西方东方学,它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中国近代的历史也不再仅仅局限于中文文献,这些“中学西书”就同样成为记载中国近代历史不可或缺的基本文献。如果确立这样的史观,西方语言的中国文献整理就成为基础性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西方语言中国史科学”或者“中学西书”的梳理与整理就成为学术界的基础性工作。“西方语言的中国文献学”或者“中学西书”包括:凡是由西方文字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籍、藏于西方档案馆尚未出版的关于中国的档案、手稿、资料。

二

中国文献学作为一门学问包括目录、版本、校勘。同样西方语言中国文献学大体也包括这几个方面,不过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清代著名学者王鸣盛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②

治西方语言中国文献学亦是如此,西方关于中国的历史记载已经有几百年历史,关于中国的研究著作、中国游记同样浩如烟海,如果不从目录入手完全不知从何读书。考狄(Henri Cordier, 1849-1924, Bibliotheca Sinica)书目、袁同礼书目是目前最基础的书目,各类专业书目也有多种,只有对这些书目都

^①金国平:《构建“西方语言中国史科学”之初议》,载金国平、吴志良:《过十字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出版,2004年。

^②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二,卷一。

烂熟于心,方可摸到西方汉学发展之脉络。

版本学是文献学之基础之一,它主要研究各种中文版本的源流,比较刻本之优劣,鉴别各种版本之真伪。

西方的中国研究同样存在版本学的问题,十六至十八世纪关于中国的知识是一个剽窃流行的时代,海员的记载、传教士的著作在欧洲相互转抄、翻译出版,一部重要的著作很快就有各种语言的翻译。从十六到十九世纪,随着欧洲各国实力的变迁,关于中国记载的语言也在不断变化。因为,在十九世纪前中国典籍的翻译以传教士为主,传教士的这些中国典籍的译本在欧洲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十七世纪时传教士的一些译本是拉丁文本的,例如柏应理和一些耶稣会士联合翻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这里包括了《论语》、《大学》、《中庸》,这本书的影响很大,很快就有了各种欧洲语言的译本,有些是节译,有些是改译,如果我们没有西方汉学文献学的知识,就搞不清这些译本之间的关系。

十八世纪时欧洲的流行语言是法语,会法语是上流社会的标志。恰好此时来华的传教士由意大利籍为主已经转变为法国耶稣会士为主。这些法国来华的传教士学问基础好,对中国典籍翻译极为勤奋。法国传教士的汉学著作中包含了大量的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介绍和翻译,例如来华耶稣会士李明返回法国后所写的《中国近事报道》(*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1687-1692),1696年在巴黎出版,他在书中介绍了中国古代重要的典籍《五经》,同时介绍了孔子的生平。该书所介绍的孔子生平在当时欧洲出版的来华耶稣会士的汉学著作中最为详细,因此出版后在四年内竟然重版五次,并开始有多种译本。如果我们对法文本和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不了解,就很难做好翻译研究。

十九世纪后英语逐步取得霸主地位,英文版的中国典籍著作逐渐增加,版本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复杂。美国诗人庞德在翻译《论语》时既看早年由英国汉学家柯大伟(David Collie)翻译的第一本英文版《四书》,也参考理雅各的译本,如果只是从理雅各的译本来研究庞德的翻译肯定不全面。

因此,认真比较西方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籍的各种版本以及各种版本之间的关系,是做好西方汉学之必须,也是做好西方语言中国文献学之基础。

张舜徽认为:“校勘学是研究总结校勘工作的一般性方法和规律的专门学问”,“在雕版印刷术没有发明以前,书籍都是手写。在抄写过程中,有时不小心在字体上加了一笔或者减少了一笔,便成为另一个字,直接改换了文句原意,影响到内容的真实,甚至牵涉到古代制度的认识,说明和处理,以致引起许多混乱。”^①这是指由稿本转写和抄写而导致的问题需要校勘。“至于古书在长期写、刻的过程中,有时无意识地掉一个字,或者添一个字;由于一个字的不

^①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第71-72页。

同,便直接影响到内容的真相,带来许多不必要的争论和纠纷。对于做研究工作的人来说,关系尤大。”^①这就提出中国文献学中校勘的重要性。

这在西方语言的中国文献学来说是同样存在的,只是在形态上有所不同。目前西方国家的档案馆中收藏着大量关于中国的手写档案,例如《耶稣会在亚洲》(Jesuitas na ásia)档案文献原藏于葡萄牙的阿儒达图书馆(Biblioteca da Ajuda),它是从1549年沙勿略到达日本后西方传教士在远东传教活动的真实原始记录。全部档案共61卷,均为手抄本,计三万页。文献是以拉丁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及法文写成。这批文献最早是由葡萄牙耶稣会神父若瑟·门丹哈(José Montanda)和若奥·阿尔瓦雷斯(João Álvares)修士等于1742-1748年对保存在澳门的日本教省档案室的各个教区资料整理而成。在这些教区中包括中国的副省北京、广州、南京以及交趾支那、老挝、柬埔寨等地。这批档案是研究中国清代天主教史和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及清代社会史的最重要的一手文献,它包括向耶稣会总会的年报告表;教区内的通信;发生在康熙年间的“礼仪之争”的伦理学和神学的争论;宗座代牧与罗马传信部争论的报导;耶稣会殉难者列传;澳门,日本和中国教区的主教和各省会长记载;航行于澳门和日本之间的黑船所载运货的货物表;澳门及各省会修会的财产清单;传教士之间的通信等,为我们提供了清中前期的许多重要情况,都是中文文献所不记载的。

类似这样的档案文献在西方还很多,对于欧美所收藏的关于中国的外文文献,至今无论是欧美学术界还是中国学术界均无一个基本的书目介绍。这批文献的基本特点是以手稿为主,基本内容是原始的传教报告、贸易报告、外交档案等。

但如果使用这批文献就有一个对文献的校勘问题。对于西文文献的校勘来说,它有着悠久的传统,1933年胡适在为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所写的序中对中西校勘学做了比较,他说:“西洋印书术起于十五世纪,比中国晚了六七百年,所以西洋古书的古写本保存的多,有古本可供校勘,是一长。欧洲名著往往译成各国文字,古译本也可供校勘,是二长。欧洲很早就有大学和图书馆,古本的保存比较容易,校书的人借用古本也比较容易,所以校勘之学比较普及,只算是治学的人一种不可少的工具,而不成为一二杰出的人的专门事业,这是三长。在中国则刻印书流行以后,写本多被抛弃了;四方邻国偶有古本的流传,而无古书的古译本;大学与公家藏书又都不发达,私家学者收藏有限,故工具不够用,所以一千多年来,够得上科学的校勘学者,不过两三人而已。”^②

对于西方语言的中国文献来说,在校勘上更有中西之共同特点,也是一个

①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第75页。

②胡适:《胡适文集》(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2页。

专门之学问。我们要学习西方校勘学的经验^①,但这批文献又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我们特别注意。

一是这批文献数量之大令人惊讶,超出一般学者之想象。英国东印度公司关于中国的手稿文献、荷兰东印度公司关于中国的手稿文献、梵蒂冈传信部关于中国的手稿文献等等,这些文献加起来可以绕地球几圈。至今我国学术界对这批手稿文献没有一个基本的把握。

二是这批关于中国的西文手稿辨读困难。由于这些手稿文献大都是十六至十九世纪的欧洲各类语言的手稿,辨读十分困难。即便在西方,能辨读这些手稿也需要专门的训练。外语能力、历史知识、西方校勘学的训练都需要具备。目前,能辨认这些手写稿的中国学者不多,因此转写就是第一难事。笔者在国外看到这些手写稿时,如果转写只能求教于国外学者。

三是这些文献内容的核对困难。尽管是西方语言的文献,但其内容是关于中国的。如上文所说的《耶稣会在亚洲》文献,其中相当多的文献内容是对中国各地传教的记载。这样即便是一般的西方汉学家,如果不是专业的研究者,即便转写成现代西方语言,这些内容对他们来说也是陌生的,如果核对其中的内容更是要有专业的知识,尤其是涉及中国古代的地名、人名,正确理解极为困难。因为记载这些文献的西方人当时并未有统一的拼读中国文字的法则,加之许多人又生活在中国各地,方言、口音夹杂其中,使人完全不知所云。即便后来威托码汉语拼音系统出现后,也减轻不了多少核对的困难。

四是翻译更为复杂和困难。来华的传教士的报告、外交官的报告、东印度公司的报告大都是他们内部文件,其内容涉及到中西之间四百多年的历史,历史跨度大,内容繁杂,不了解历史背景,很难把握。他们对中国文化经典的翻译,也有着自己的文化立场。缺少了跨文化的视角,随之产生的“误译”和“误读”实为正常。

三

在笔者看来,西方语言之中国文献的研究整理比中国文献学和西方自身文献研究整理还要困难。

中国文献学的目的是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学术之发展有一个宏观的了解和把握;西方语言之中国文献学业亦是如此。尤其从事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西方的翻译和传播研究,一定要从文献学入手,从目录学入手,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在翻译研究上对版本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一个清楚的了解,为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国家目前对汉籍外译投入了大量的费用,国内学术界也有相当一批学者在从事这项事业。但我们在开始这项工作时应该摸清西方汉学界已

^①苏杰编译:《西方校勘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经做了哪些工作,哪些译本是受欢迎的,哪些译本问题较大,哪些译本是节译,哪些译本是全译。只有清楚了这些以后,我们才能确定新的翻译政策。显然,由于目前我们在西方汉学的文献学上做得不够理想,对西方汉学界近四百年以来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情况若明若暗,造成国内现在确立的一些翻译计划是重复的,这在学术上是一种浪费。即便国内学术界进行重译,也需要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展开。

因此,建立西方语言的中国文献学,或简而称之“中学西书文献学”是展开西方汉学研究之基础,是做好中国典籍外译和流播研究之基础。同时,也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将中国史放入全球史中加以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这里从文献学上对做好西方语言的中国文献研究的方法提出一个初步的设想,以期引起学界之重视,开启西方语言之中国文献之研究和整理,将其纳入中国学术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只有将这批西方语言的中国文献彻底掌握,我们才能真正写出全球史背景下的中国近代历史文化之研究,才能揭示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影响,才能在全球史的背景下说明中国文化之意义。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